

拓展全球数字贸易新空间

王德卿

算、大数据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快速增长。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电子商务市场之一，数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数字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在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化水平。同时，我国还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内容、智能制造等高端数字贸易领域，推动数字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和协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中国还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合作，推动数字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我国数字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得到提升。

积极拓展数字贸易新空间的重大意义

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我国积极拓展数字贸易新空间，对于创造新的国际贸易增长点、维护经济全球化具有重大意义。

发展数字贸易有利于培育更多新增长点。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数字贸易占比不断攀升。《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 2023》显示，2022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 3.82 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的 53.7%。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并且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估计，保持现行全球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全球数字贸易的潜在税收收入是当前规模的 2.5 倍。主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积极拓展数字贸易新空间，可以为经济发展挖掘更大的增长潜能。

发展数字贸易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贸易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效缓解了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业分工效率。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比特属性性能不断降低复制成本和运输成本，打破地理距离对贸易的物理限制，增强产品和服务的可贸易性，不断扩展贸易空间。就我国而言，随着平台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兴起，原本只能服务于大宗商品交易的国际贸易实现了“全球 5 日达”快捷贸易，为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了分享全球市场红利的低成本渠道，有效对接更广阔的外需空间。同时，国际市场的风向标又会引导国内企业向更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方向转型，从而激励企业在产品研发、品牌建设等方面的创新积极性，以更好地满足国际市场的多元需求，进而有力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数字贸易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数字贸易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为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进入全球市场提供了更多机会。数字贸易也将重塑全球供应链条，促进全球贸易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多链协同发展，加快重塑全球贸易网络 and 产业链分工，优化全球利益分配格局。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持续向纵深推进，数字化

发展环境日臻完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滋润了创新的土壤，完整的工业体系让本土的集约优势更为突出，塑造了物美价廉、层次多元、迅速强大的制造业和数字产品生产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与海量的应用场景培育了有竞争力的平台企业，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经验。顺应当前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大势，以新质生产力为创新基础，以平台企业国际化为突破口，扩大国内供应链与国际多元需求的有效对接面积，抢占国际市场先机，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出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大提升全球贸易竞争力。

如何把握数字贸易带来的增长新机遇

现阶段，我国发展数字贸易仍面临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数字鸿沟、政策协调、标准不统一等难题。我们需积极应对挑战，把握数字贸易带来的增长新机遇。

建立完善数字贸易政策体系。我国外贸体系长期服务于传统货物贸易，尚不能适应数字贸易需求的迅速发展。要进一步完善国内法律法规，提升与国际惯例的契合度，注重对出海平台企业的健康培育引导和反垄断防范。政策理念应凸出普惠性，桥接数字鸿沟，让中小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也能分享数字贸易红利。数字贸易监管应秉持“以数治数”理念，在跨境数据高效流通、不发生数据安全事故、促进数字贸易产业发展、保护个人数据隐私之间寻找平衡点。

主动促成贸易规则统一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当前，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正在加速形成之中，我国应以提升国际合作互信为前提，以增强监管互操作性为主要目标，在积极贡献中国规则方案的同时，吸收和学习已成型的国际通行规则 and 标准。在规则形成过程中，要采取灵活、渐进式的制度安排，在数据流动、数字产品和服务税收、市场准入等领域持续提高国际合作的便利程度。

持续加强数字技术优势转化。数字技术的创新优化是数字贸易的发展基础，也是提升国际数字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依托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拓展基于数字场景的创新应用场景，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数字贸易优势，不断建立完善与数字贸易相适应的法治环境，提高本土应用经验的普适性，加大对传统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培育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加速新型数字技术应用落地，超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平台。



对 1929—1933 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再思考

文 洋 李佳卉

1929—1933 年期间，全球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大萧条。这场大萧条发源于美国，随后快速席卷全球，是 20 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强度最大的经济衰退，也是人类经济史上的至暗时刻。

股市崩盘触发失业率飙升

1920 年代，美国经济一片繁荣，身处“咆哮的二十年代”。然而，在繁荣的表象之下，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信用消费文化盛行，家庭和小企业等小额借款人债务急剧增长，国家债务积压严重。同时，大量资金涌入股票市场，股票价格狂涨，泡沫日益膨胀。1929 年，美国有 200 万至 300 万家庭把钱投入到股市，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买卖股票成为美国人的共同爱好，整个国家都沉醉其中。

1929 年 10 月，华尔街股灾给了美国沉重一击，股市在经历了 5 年狂涨之后突然大崩盘，美国开始陷入经济危机。根据穆雷·罗斯巴德所著《美国大萧条》的记述，美国的国民收入从 1929 年的 810 亿美元，下降到了 1932 年的 410 亿美元，接近腰斩；工业产值下降了 47%，真实 GDP 下降了 30%；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下跌 89%，全美国银行倒闭将近一半。这些数字的背后，1500 万人失去工作，失业率最高达到 26.7%，有 900 万个储蓄账户被清空。

大萧条最初在美国爆发后，迅速蔓延到欧洲、北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殃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于 1930 年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大幅增加商品进口税，各国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结果是世界贸易总额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这场危机持续了 4 年，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深远而沉重的打击。

大萧条的影响不仅仅囿于经济领域，也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极大冲击。经济大萧条期间民众普遍陷入贫困，生存底线不断被压低，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 and 希望，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秩序难以维持。贸易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内部矛盾和分歧不断被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和日本国内极端民粹主义抬头，不断鼓吹

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最终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危机根源

大萧条最初的导火索原本只是华尔街的一场股灾，但是却演变成波及全球的重大经济社会危机，是诸多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

总需求下降引致危机爆发。在华尔街股灾后，信用融通环境恶化，市场流动性紧缺。然而，美联储采取消极的货币政策，加重了通货紧缩程度，导致居民和企业需求大幅降低。同时，实际利率的提高，使得中小企业、农场主和普通家庭的融资成本增加，更容易出现信贷违约、破产或失业，总需求迅速下降，造成工商业衰退，大萧条全面爆发。

金本位制度加速危机传播。1929 年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一国的货币供应量受该国黄金储备量的限制。理论上，金本位具有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遏制通胀或通缩的自动调节机制。但实际上，黄金盈余国在大量黄金流入时，往往采取冲销措施，阻止本国扩大货币供应量，金本位的自动调节机制就会失效。尤其是美法两个主要黄金盈余国出现通货紧缩，引发了国际性的“黄金争夺大战”，造成全球性的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

总供给不足延长危机持续时间。总供给与名义工资和价格水平密切相关。一方面，物价水平的下降会直接引致总供给的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工会、劳动合同与政府最低工资法规等因素存在，名义工资具有黏性特点，不能及时地根据价格变化进行彻底调整，再加上突然的通货紧缩，导致工人实际工资大幅增长而超过市场均衡水平，迫使企业劳动力需求减少，进一步抑制了产出，更加不利于经济复苏。

启示

大萧条持续影响着经济学家的信条和施政者的决策，在当前世界



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对大萧条的再思考为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防范过度信贷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大萧条发生前美国采取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大规模信贷扩张，而泛滥的信贷引发了股市泡沫和投机狂热，这成为大萧条的导火索。因此，必须将信贷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以此防范金融系统风险。一是保持宏观杠杆率平稳，高度关注宏观杠杆率运行态势，警惕并避免经营主体承担超出能力的负债。二是限制过度投机行为，引导资本在市场的规范运作，防止资金空转、脱实向虚，推动金融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三是建立有效的货币发行、流通和调控体系，保障对信贷的动态控制，实现从货币到金融的广泛稳定。

控制缩小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大萧条期间最突出的矛盾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其根源在于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量投资扩大生产，而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有限，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因此，应通过制度变革，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带动全社会有效需求提升。一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确保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保障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稳步提高。另一方面，通过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等手段适度抑制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张，将这些税收更多用于对低收入居民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

坚持贸易自由化，维护市场有序运行。大萧条与其他经济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实属罕见，其关键原因在于危机期间美国颁布了新的关税法，极大地提高进口商品关税，由此引发多国之间的贸易战，导致世界经济全面恶化。因此，要避免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按照规则和共识妥善解决贸易争端，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要坚持推进经济全球化，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维护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法国十分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打造了许多收藏大量艺术珍品的博物馆。从汇集世界艺术瑰宝的卢浮宫，到展现 20 世纪以来现代与当代艺术风貌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些博物馆不仅体现了法国对丰富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同时也为全球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交流作出了贡献。法国是如何打造博物馆的呢？

立法保护与政策支持。法国在推进博物馆建设与发展上采取了较为全面的措施。在立法保护层面，制定了详尽的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了博物馆在藏品采集、保存、展出和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和法律责任，确保了博物馆藏品能够安全与长久的传承。其中包括设立国家文化遗产名录系统，对重要历史遗迹和艺术作品进行认定和严格保护，严禁非法交易和损毁。在政策支持方面，法国持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不仅为公立博物馆提供稳定的运营经费，还拨款支持大型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新博物馆的创立以及重要藏品的收购。对于非国有博物馆，法国推出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减免捐赠艺术品的个人所得税，鼓励社会各界向博物馆捐赠藏品或资金，共同参与博物馆建设。此外，法国还十分重视博物馆的公共服务职能，通过立法保证所有公民能够平等地接触和享受博物馆资源，比如对学生和特定群体实行免费或优惠开放政策，并积极推动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将博物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资源整合与藏品征集。在资源整

法国如何发展博物馆事业

王 雪



合与藏品征集上，法国采取了系列有效措施。一方面，通过国家级的文化资源整合机制，统筹管理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确保各类珍贵藏品得以集中、有序地收藏和展示。法国建立了完善的文物登记备案系统，对本国现存的所有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普查和分类，明确了藏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便于集中力量进行重点保护和挖掘。另一方面，法国大力支持博物馆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藏品征集工作。其中包括对本国重大考古发现的优先收藏，以及积极参与国际艺术品市场，通过购买、接受捐赠或交换等方式获取海外珍贵文物。同时，法国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私人收藏家和海外人士向法国博物馆捐赠藏品，对于符合规定的捐赠行为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其他荣誉表彰。此外，法国尤为注重藏品的研究与保护，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专业化的文物修复和保养，力求使每件藏品在博物馆内得到最佳状态的展示，真正发挥其在教育、科研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设施升级与技术创新。在设施升级与技术创新领域，法国倾力为受众打造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体验。在硬件设施升级方面，不仅关注建筑物本身的改造和扩容，如对历史悠久的博物馆进行现代化改造，卢浮宫的玻璃金

字塔扩建项目等，还强调内部设施的优化，包括改善照明系统以更好地地呈现艺术品，增设无障碍设施确保残障人士的参观便利，以及配备先进气候控制系统以保护藏品免受环境因素损害。此外，法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博物馆领域的应用，通过集成数字技术，引领博物馆迈入信息时代。例如，开发基于移动设备的语音导览和 AR 技术，让游客在观看实物展品的同时，能深入了解背后的故事和历史背景；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参观路线，减轻人流量压力，提供个性化参观建议；建立线上数据库，方便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公众查阅藏品信息，扩

大知识传播的边界。不仅如此，法国博物馆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积极发声，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让更多人打破地域限制，接触到法国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

教育推广与社区参与。法国高度重视博物馆在教育推广与社区参与方面的作用，将其视为文化传承和公众教育的关键载体。在教育推广方面，积极推动博物馆与各级学校的紧密合作，将博物馆教育资源纳入课程体系，定期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学习，举办各类专题讲座和工作坊，使博物馆成为课堂之外的知识拓展平台。此外，针对不同年龄段和兴趣群体，策划丰富多样的公共教育项目，如家庭日、夜游博物馆等活动，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学习资源，助力全民终身学习。在社区参与方面，积极倡导参观博物馆成为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博物馆举办面向本地居民的各类活动，如免费开放日、社区文化艺术节、志愿者招募计划等，促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更深入地了解 and 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通过这些方式，让博物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收藏和展示功能，转而成为活

跃的知识传播中心和社区文化活动枢纽。

国际合作与品牌塑造。法国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与品牌塑造战略，以提升其全球影响力。一方面，法国政府大力支持博物馆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机构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通过举办跨国展览、互换藏品、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共享各国文化遗产，促进国际间文化艺术交流互鉴。例如，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于 2013 年首次携手，举办了“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卢浮宫馆长亲任策展人，带来 280 件（套）涵盖埃及、腓尼基、迦太基、希腊、罗马等古文明精选文物，其中许多展品是首次来到中国。将知名博物馆与其他国家共同策划主题展览的做法，有效将本国艺术珍品带到全球各地，同时也将世界各地的珍贵藏品引进法国，让法国同世界人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丰富多样的世界文化。另一方面，法国十分重视博物馆品牌的塑造与全球推广，通过举办国际知名的大型文化活动，如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戛纳电影节等，以及利用各种国际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报道，不断提升法国博物馆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以上具体措施，法国成功地将其博物馆打造成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全球公认的文化品牌。

